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长
彼得·阿尔特迈尔

国家工业战略 2030

——德国和欧洲工业政策的战略指南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编译

2019年2月

前 言

该战略首次制定了一份连贯的、基础的、面向国家和欧洲的工业战略。它旨在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提供合理的答案，即“在全球化加深，创新进程极大加速和其他国家采取扩张或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维持高水平的私人和公共财富？”

自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时代起，我们的国家就直接负责创造和保护财富。德维希·艾哈德的“人人共享繁荣”（Prosperity for All）计划成为了对所有社会阶层所有公民的深远政治承诺。

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一承诺已经达到了当时无人能想象的程度。今天，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繁荣承诺（还包括自由和安全）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它由工业、社会伙伴和国家共同保证。

社会市场经济使得我们的高度繁荣成为可能。它已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它优于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四十年前，市场经济的要素引入了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取得了胜利。

然而在德国，从 1969 年空客成立到对个别公司（萨尔茨吉特、霍尔兹曼、欧宝、万乐）进行“救援尝试”以处理光

伏公司纠纷或生产半导体和微芯片，国家对经济始终存在产业政策干预。其中一些干预措施失败了，因为它们太短暂了而且国家不是更好的企业家。与空客公司不同，这些旨在达成精准效果的干预政策触发了分配不当，但没有履行任何战略职能。

因此，该工业战略草案有意选择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它界定了一些特殊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国家干预可能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以避免对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造成严重不利。与此同时，它有助于塑造面向未来的市场经济，并为必要监管的辩论奠定基础。

全球经济力量平衡已发生巨大变化。世界市场正在经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全球化和创新加速，另一方面国家干预增加，多边协定式微。这会影响到国家和公司。旧的角色消失，新的角色出现。贸易往来发生变化。其中有许多赢家，也有许多大输家。全球范围正在进行一场大洗牌。现在这场动荡刚刚开始。

这给德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对这些新发展和转变做出反应和采取行动。作为一个全球成功的工业区，德国必须积极和成功地参与这一进程，而不是被动地忍受，任凭其发生。因为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竞争不会停歇，而且存在很多风险：

如果失去关键的技术技能，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

受到严重破坏，这将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国家的行动能力及其在几乎所有政治领域的塑造能力产生巨大影响，最终也将危及国家机构的民主合法性。

能否成功掌握和塑造新的全球挑战和变化关系德国和欧盟所有成员国的直接国家利益，乃至欧洲的利益。我们希望推动创新技术并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

凭空等待和无所作为是不够的，采用错误的做法是不行的。多数情况下，加强和振兴市场经济是对不可阻挡的新技术和工业变革的最佳答案。总的来说，如果要保持经济的未来可行性，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市场经济。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国家公司的个人商业决策的总和不足以抵消或阻止全球权力和财富的转变：一家公司关注的是公司本身的发展，而非整个国家的进步。在一个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力量无法保持其创新和竞争力的情况下，并且只有在这中情况下才有理由激活、推进和保护产业政策。这是国家的责任和任务。

该战略草案建立在社会市场经济既定原则的基础上，并制定了可在例外情形下证明或否认国家贸易的标准。这有效地限制了国家干预及其在经济考虑所需情况下的合法性。

去年秋天，当我制定工业战略的计划公之于众时，我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甚至是从我未预料的方面，包括商业、社会 and 跨党派的政治。也有批评性的意见。两者都加强了我

的信念，即工业战略和随之而来的辩论是明智和迫切需要的。

柏林，2019年2月5日

彼得阿尔特迈尔

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长

目标

•“国家工业战略 2030”的目标是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合作，帮助确保并重新获得相关领域在国家、欧洲和全球层面的经济和技术卓越性、竞争力和行业领导地位。

•这是确保和扩大德国经济表现的必要先决条件，从而长期保障国家工作机会和市民的繁荣。

•其中一项目标是到2030年逐步将工业在总增加值中的份额提高到德国的25%和欧盟的20%。

•实现目标的选择手段主要是自由市场、私人和自我责任。政府行动只能是例外的、暂时的，只有在十分重要、所有其他选择都证明不充分的情况下才能采取。

•通过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坚定反对他国的任意干涉并始终保持我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德国和欧盟也将为未来全球社会市场经济的出现做出贡献，这将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市场和繁荣。

背景

德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的实力。德国工业占总增加值的 23%，在欧盟排名前列，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作为一个经济国家，我们在国际比较中如此成功的原因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德国工业竞争激烈，创新性强。2015 年，德国在研发方面投入了约 530 亿欧元。这相当于私营部门总支出的 85%，几乎是占总增加值比例的四倍。

德国现在仍然是领导者的主要工业部门包括：

- 钢铁、铜和铝工业
- 化学工业
- 机械和设备工程
- 汽车工业
- 光学工业
- 医疗器械行业
- 绿色科技行业
- 军备工业
- 航空航天业
- 增材制造（3D 打印）

如果没有高比例的工业就业机会，德国就无法保持高收入和高水平的教育、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基础

设施。因此，加强工业基础是国家的利益和使命。为此，国家需要适当的工具和手段。在使用条件和限制之外，我们还需要一场公开、公正、以结果为导向的辩论。

挑战

优越的经济形势不是天赐的。它经常受到国际竞争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公司的任意干预的影响，因此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实现和确认：

- 在主要新兴国家劳动力和制造成本较低的优势与德国工业在技术和质量方面的巨大领先优势相当。然而，随着各国通过各种方法发展技术知识，通过在欧洲的合资企业或收购，这一领先优势正在缓慢但明显地消失。结果是，即使德国公司目前仍无与匹敌，但竞争压力在不断增加。新兴国家工资和社会成本的缓慢上升只能部分抵消这种转变。

- 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在消费电子领域一直以来的领先地位被日本、韩国等国家取代。从那时起，这种损失已被证明是不可更改的。

- 这导致欧洲其后在电信技术和计算机电子（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等新领域未能立足。

- 大多数新型碳纤维材料的生产都不在德国。

- 汽车工业的成功对于德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一段时间以来德国的汽车工业面临着巨大挑战，并且尚未被成功克服。

这些挑战涉及废气排放增多和控制废气排放水平，替代驱动系统和电动汽车的发展，自动驾驶的重大创新，全新“移动出行”（**Mobility**）概念的出现。

- 目前，全球成功的平台经济互联网公司几乎都出自美国和中国。而不在德国和大多数欧盟国家。这种状况目前还看不到改变。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 在人工智能（**AI**）领域，我们在研究方面仍处于有利地位。但在应用的商业化上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与领先的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差距似乎在增加而不是缩小，没有一家德国公司像美国主要的平台/软件/移动硬件公司那样在这个领域投入尽可能多的资金。德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集中创业、科学和政治力量。重要的是赶上主要技术集团，建立数据主权并充分利用新关键技术经济潜力。

- 在新生物技术领域，欧洲存在落后和远离国际发展趋势的风险。

- 几乎所有创新驱动的领域（尤其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领域）正在涌现新的、大型的和全球成功的公司，这些公司拥有超出任何一家 **DAX** 公司的巨大资本和市场力量。目前这种发展跳过了德国。在这些领域成功的德国和欧洲初创公司越来越多地从某个增长阶段就开始通过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获得融资。因此，这些公司逐渐成为美国公司，而且获得融资越多越快就越成功。

目前为止，在上述领域的损失被其他传统强势领域的增长所抵消。近几十年来，德国汽车工业极大地扩大了其领先地位。在高端领域，现在约 80% 的汽车由全球的德国公司生产。这一进程至少意味着德国的工业岗位数量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总的来说，德国目前的工作岗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特别是在传统优势领域，创新和数字化的影响正日益显现。因此，对上述未来技术无法突破是未来在传统优势领域取得长久成功的直接风险。只有在新的未来领域强大起来，我们才能在核心工业领域保持传统优势。

下列变化正在快速发展：

- 基于科学研究，我们可以认定就业总数将增加而不是减少，但是现有的大量工作将受到转型的影响。

- 然而，由于许多变化具有颠覆性，在那些被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消除现有工作的国家和地区，不一定会出现新的、创新的和可持续的工作岗位。

- 因此，如果无法在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领先地位，德国和欧洲可能面临增加值上重大损失的危险。

要长期保持德国工业的未来和竞争力，必须能够及时识别和预估全球发展趋势。对现有优势的了解不应导致对未来变化的无视。日本索尼集团在庆祝其音乐 CD 史上最高销售量之时已经达到了这一纪录的顶峰，不久之后就衰弱了，Walkman 技术逐渐被 ipod 取代。

我们需要对欧盟所有经济体（包括德国）的优势和劣势进行独立、全面和冷静的分析。现有的研究评估标准往往不完整或不透明。我们需要知道所处的位置，以便共同掌握未来。

作为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一些国家已经做出一段时间的反应并重新定位。以下是一些典型例子：

- 在美国，主要由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通用电气等大型科技公司推动技术发展。这些公司共投入数千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数字化、自动驾驶和生物技术。美国前任政府为这一发展给予了全面支持。现任政府倡导美国优先政策，通过提高关税和签署双边协定振兴和保护钢铁、铝、汽车、农业等传统产业，将以前失去的增加值回流美国。

- 在日本，除汽车行业和电子行业外，其经济优势还包括人工智能、网络设备和机器人。日本软银集团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网络设备和机器人技术）设立了一项投资基金——“Vision Fund”，该基金十年内将增长至 1000 亿美元。

- 中国在产业政策方面尤其成功。中国在 2015 年制定了“中国制造 2025”，其中采取了积极的产业政策旨在加强十大领域的关键技术。十大领域包括信息技术、高端机器人、航空航天、海运、电动汽车、铁路运输、生物制药、医疗技术等。2017 年，中国宣布拟在 2030 年前成为世界人工智能的领导者。中国国有企业中国招商局集团（CMG）于 2018 年

7月决定成立150亿美元的技术基金(中国新时代科技基金)。该基金将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中国的科技公司。通过新丝绸之路项目，中国试图主动保护销售市场和物流。这一战略将市场经济原则与前瞻性和侧翼政治相结合，已取得了成果。在中国，世界知名公司已经出现，未来几年整个行业都可能被这些公司技术垄断。结果是不能再进行有效的国际竞争。

由此可见，我们与之竞争的重要国家也认识到未来的挑战，甚至比我们认识得更早，并列入了政治议程。这也将对德国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工业政策战略在世界许多地方正在复兴。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完成其任务。

存在一些快速扩张的战略，其目标非常明确，即为自身经济征服并且尽可能地垄断新市场。

此外还存在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倾向，这表明他们的成功是值得怀疑的。

政治长期以来忽视了这些发展的全部。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和提出自己的概念，因为我们的伙伴国家正在政治层面这样做，并设定了未来的路径。

对经济政策根本挑战缺乏考虑和不予回应的德国及欧洲的政策将使自己的公司陷于困境并削弱它们。

改变游戏规则的基础性创新

创新是一个始终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持续过程。然而，发生在更长时间间隔的“基础性创新”将对重要的甚至所有的经济部门及其价值链产生根本性影响。这些创新往往具有“颠覆性”，即彻底放弃此前的工艺或技术，并用新的工艺或技术取而代之。这对任何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都构成巨大挑战。基础性创新通常也具有地理上的颠覆性，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此前的市场领导者造成严重的破坏。

基础性创新的例子包括蒸汽发动机、铁路、电力、内燃机和汽车、飞机、无线电和电视、计算机和因特网的发明。

只有拥有并掌握新技术的人才能永久保持在竞争中的地位。

当前最重要的基础性创新是数字化，特别是人工智能应用的迅速普及：

在世界市场上出现全球平台经济是互联网时代全球市场经济合乎逻辑和不可避免的产物。它可以极大地提高价格的可得性和透明度，从而有助于货物和服务流动的国际化，并创造更多的竞争。相反地，少数公司的垄断也可能导致市场减少。

主要的互联网平台现在拥有大量的资本和数据，正在成为全球创新和价值链变革的驱动力。

因此，大型经济体要持久成功必须适当地参与平台经济的价值链。到目前为止，德国和欧洲并没有做到这点。在其

他领域，也存在失去竞争地位的巨大风险。在汽车、医疗、数字云学习（远程学习）等多数相关领域，洗牌过程还未完成。但世界上许多公司也在致力于成为这些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是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最大的基础性创新。它扩展到所有经济、工业和服务业、物流和交通、工作、私人和社会生活中。通过机器学习不断优化和发展自己的应用程序是一种新的、额外的创新加速过程。未来的关键 AI 应用包括自动驾驶和医疗诊断。德国在研究领域仍处于有利地位，但在实际应用方面落后很多。

如果搭载人工智能的自动驾驶数字平台来自美国，电池来自亚洲，那么德国和欧洲将失去该领域增加值的 50% 以上。相关影响远远超出汽车行业。因此，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汽车行业的公司，而且影响所有经济和国家利益相关者。

机器和互联网（工业 4.0）的结合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游戏改变者。机器（生产）的“真实”世界与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之间的分割日渐消失。机器通过互联网连接到其他机器和人员。互联网呈现出一个新的层面，没有使用互联网的工业生产在经济效率上是不可想象的。问题是在机器和网络的融合中由哪一方来主导并不清楚，变化才刚刚开始。

未来其他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可能包括纳米和生物技术、新材料和轻量技术、量子计算的发展。

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速度

与之前相比，今天的创新速度已大大加快。早在 20 世纪初，电视、传真和移动电话的可能性已基本得到认可。然而，从技术开发到实施并商业化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

过去十五年来，创新的速度从根本上加速了，特别是在数字相关和未来领域。这增加了跟不上发展的风险。那些跟不上发展的公司 and 经济将从“规则制定者”（rule-makers）变为“规则接受者”（rule-takers），成为那些抓住有利时机的国家的扩展工作台。

通过将数字革命的关键方面与传统研究和实施相结合，创新的步伐将大大增加。

AI 应用程序的使用将为此做出重大贡献。未来必须在更短的时间窗口更快地决定是否进入特定领域的创新竞争，这一过程与以前的创新周期下相比更不可逆。

国家产业政策的基准

- 我们经济的工业和技术主权和能力问题是维护德国可持续性的关键挑战。我们的经济必须继续能够应对所有重要领域的全球竞争，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和基础性创新方面。

- 工业在总增加值中的份额是一个量化目标，仅仅以此为基准是不够的。但它可作为朝着正确或错误方向发展的重

要指标。在德国，扩大到总增加值的 25%被认为是可行的。整个欧盟的任务要困难得多，因为许多欧洲国家仍在全面去工业化。趋势逆转是德国的经济利益，预计欧洲的工业复兴将为所有欧洲国家提供重要的推动力。到 2030 年，整个欧盟工业所占比例预计会上升到 20%。

- 保持封闭的价值链非常重要：如果价值链的所有环节，从基础材料的生产到加工、分销、服务、研发，都在一个经济领域完成，那么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将更有弹性，更有可能实现或扩大竞争优势。因此，我们需要对现有价值链中已经中断或受到威胁的部分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并就防止或扭转进一步侵蚀的适当措施达成一致意见。

- 我们需要扩大现有优势，同时在其他他人比我们更好的领域启动追赶进程。经验表明，曾经被其他竞争对手“打败”的行业很难或无法恢复。因此，我们必须为每个工业就业机会而战。过去对“肮脏的旧产业”和“清洁的新产业”的错误区分具有误导性。

- 加强工业中小企业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德国的特殊优势。许多中型公司通过高度专业化的产品和应用（隐形冠军）拥有巨大的技术能力和竞争力，“征服”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创新特别是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它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其特殊技术能力往往在其他领域。他们比以前更需要定制化产品和支持。

- 德国和欧洲冠军：规模很重要！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全面的世界市场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工业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竞争或提供某些产品和服务需要多大规模。大型商用飞机仅能由一定规模的公司建造。铁路系统的创建和现代化带来了 300 亿美元以上的重大项目。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大型互联网平台需要大量资金。这一点在工厂建设、国际金融和银行业务以及许多其他任务中同样适用，这些都需要与美国或中国竞争对手保持同等水平的大型和强大的参与者。

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达到完成重大项目所必需的规模的公司，并在与主要竞争者的国际竞争中证明自己，这将在实际上导致被世界市场中重要且不断增长的部分排除在外。

因此，值得忧虑的是，多年来德国几乎没有这样规模的新公司，而 AEG 或 Grundig 等前世界市场领导者早已失去了自己的地位。过去二十年来，在美国和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主要全球市场集团，特别是电信、互联网和数字化市场。这导致这些国家在某些领域的增加值大幅增加。

对世界市场而言，德国或欧洲的合并是有意义和必要的。但根据本国和区域市场现行法律，这种合并通常失败了。必须审查欧洲和德国的竞争法，并在必要时进行修订，以便德国和欧洲公司能够在国际水平上平等竞争。

西门子、蒂森克虏伯、汽车制造商、德意志银行等现有

的冠军已经存在了 100 多年甚至更长，并且已经成功地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空客是最近成功的一个案例，但距空客的成立已经过去了 50 年。

这些公司的长期成功和存续符合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因为它们对价值创造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塑造了全球德国商业和工业的良好形象。

- 许多公司正试图通过收购其他国家的公司来提高其在某些市场的地位。德国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在未来这种收购也是可能和需要的，因为这符合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国家禁止外国竞争者对公司进行收购必须继续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并且只有为了抵御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所必需时才能在个案中使用。

在收购主要关系技术和创新领导力而非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下，主要应由德国工业及其参与者通过合适的出价来防止此类收购。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可以提供鼓励和支持。

只有在非常重要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在一定时间内充当公司股份的收购方。但总体而言，从长远来看，公共股权的份额可能不会增加。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国家参与公共机构 (**national participation facility**)，要求其定期向议会报告。原则上，收购新股权必须与其他股权的私有化相平衡。

- 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原则上给定的行动方

案必须根据新的经济比例原则来判断和决定：

- 1.过程的经济意义越低，国家就越不能干预经济过程。
- 2.一个过程的经济意义越大，主动和激活国家参与的空间就越大。这可能包括对经济至关重要的挑战，还包括临时收购股份或给予援助。
- 3.原则上，每次干预都必须限于对实现经济目标而言必要且适当的措施。
- 4.关于对价值链非常重要的电池生产问题，政府给予支持，例如支持形成财团，似乎是明智和充分的。
- 5.对于平台经济学、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这些重要问题，如同空客公司一样，国家的直接参与以实现目标似乎是必要和合理的（AI-Airbus）。

监管原则

- 在重要行业的竞争力方面，对德国工业生产的框架条件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审查和改善。

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出于环境保护、气候保护、能源转型、社会政策等原因进行了干预，这些框架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提高了成本，与那些并未如此做的国家相比其竞争地位也在恶化。

只要国家为了更高政治原因进行必要干预而给予补偿，以抵消对竞争的不利影响，这不是补贴，而是恢复竞争中的

可比性。这必须符合欧盟法律。

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域包括：

- 电力和能源价格
- 公司税额
- 社会保障缴费率（必须保证永久低于 40%）

• 国家决不会干预各个公司的商业决策。每家公司都必须自己决定采取哪种策略，进行哪些投资。这源于决策和责任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是否投资于新技术取决于每个公司。如果市场经济是成功的，那么作为创业行动的结果，成功失败均有可能。

• 国家不应随意干预个别公司之间的竞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竞争中。只有这样，优化资源分配的过程才能成功，更好的提供者才能证明自己能为每个人创造最大的附加值。

• 市场原则和比较优势（里卡多）仍然有效。遵守和执行这些原则符合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这意味着单一经济体的成功不会以牺牲另一个经济体为代价。相反，认可并应用这些原则可以使所有人共同成长并变得更强大。

• 因此，德国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原则，即使这可能对自己的公司有害。我们希望减少和消除全球的关税和税收，特别是对所有领域的工业产品。

• 我们希望加强和扩大多边主义，因为它是反对任何形

式保护主义的最佳保障，也有助于创造经济和政治的稳定。

- 自由开放市场需要给所有市场参与者和竞争者提供可比框架条件(公平竞争环境)。这些并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特别是因为一些国家不遵守现行规则。因此，为了经济利益，德国必须集中精力消除现有的不平等和不利因素。

-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成功为全球社会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可能的话，德国和欧洲必须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反对其他国家对竞争的扭曲。否则，强大的公司就可能面临受到其他国家干预处于不利地位并被迫退出的危险。这就需要：

- 1.审查并在必要时对现有的国家援助和竞争法进行改革。
- 2.在具有高度创新性基础效应的创新领域提供临时补贴，以为了整体经济利益提高竞争力。
- 3.更有效的反对倾销和滥用支配地位的行动。
- 4.在规模是业务成功的先决条件的领域促进公司合并。

欧洲方面

鉴于欧洲单一市场的巨大成就，德国的工业政策也必须始终是欧洲的产业政策。属于内部市场的国家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因为其中一个国家的较高附加值也有利于内部市场上所有其他成员的经济。

这就是为什么欧盟也需要采取以欧盟主要工业化国家

战略为基础的工业战略。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加强整个欧洲的工业竞争力。许多欧盟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必须逐步取消和扭转。只有欧盟成员国共同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这才会成功。

到目前为止，欧盟和欧元区在财政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决策，但对基本经济政策问题的讨论却很少。有几个不同的理事会组织讨论个别领域的经济政策（竞争力委员会、贸易委员会、电信委员会、能源委员会），但欧盟缺乏汇集讨论和决定所有不同经济政策的机制。

欧洲“工业之友”的模式是第一步。除了这种不具约束力的交流外，欧盟将来还需要一个“工业部长理事会”，现有个别理事会的数量不应当增加而应当减少。

后续推进

一项工业战略的令人信服和成功的发展和实施需要所有主要参与者的互动。他们必须共同确定优先事项和措施。国家对公民利益的总体责任不受影响。

因此，该草案是第一步。该草案并不完整，也没有获得一致同意。在未来几周内，来自工业、商业、工会、学术界的利益相关方将对该草案进行深入讨论。德国联邦议院和各州的议会团体也将进行讨论。

此后，联邦政府的修订战略将由联邦议会商定和决定。

同样，对于法律变更或其他措施（例如竞争法、参与公共机构），有必要指定包括具体实施步骤的路线图。

在国家战略的基础上，联邦政府将致力于迅速制定和通过相应的欧盟工业战略，并促进对其他成员国产业政策问题的深入讨论。

该战略要获得成功，重要的是对产业政策的实际发展和联邦政府政策的充分性定期进行重点评估，而不必建立一个新的、复杂的和耗时的监测过程，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建议
在 2021 年初开展第一次评估。